

中国现代文学 作品赏析

桂化德 著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赏析

桂化德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赏析 / 桂化德著. —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688-2943-4

I. ①中… II. ①桂…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欣赏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8648 号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赏析

- 著 者 桂化德 著
责任编辑 于衍来
装帧设计 中图时代
出版发行 延边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 133002
网 址 <http://www.ydcbs.com>
电子邮箱 ydcbs@ydcbs.com
电 话 0433-2732435 0433-2732434(传真)
印 刷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 张 9.7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88-2943-4
-
- 定 价 40.00 元

绪论 现代文学概述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人们习惯于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特征,将其分割为两个时期:1917年1月“文学革命”开始后至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前的文学,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现在也有人称为“民国文学”;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以后的文学,称为“中国当代文学”。这两个阶段的文学,如果连在一起讲,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

1. “五四”时期(1917—1927)

1917年1月和2月,《新青年》分别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标志着“文学革命”正式开始。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宣告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终结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

文学革命,同这时期所有的革命运动一样,也是以政治革命为目标的,同时,也是受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产生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封建思想,而长期以来,封建文学已经成为封建思想的重要载体,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要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就必须废除它的载体。而要彻底废除封建文学,就必须进行文学革命。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必然导致一场文学革命的产生。文学革命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

到1921年,酝酿多年的文学革命只经过了短短四年“火山式的爆发”,就迅速地进入了成熟和收获的季节。新文学运动逐渐趋于高潮,传统旧文学几乎完全崩溃。在这一年里,随着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许多重要文学社团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以文学革命为起点的新文学出现了一个流派蜂起、异彩纷呈的繁荣局面。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沉沦》,特别是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的先后面世,标志着新文学完全战胜了旧文学,确立了新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主流地位。

1923年以后,虽然狂飙突进式的革命风暴逐渐跌入了低潮,但是,被文学革命唤醒的新文学作家,在经过思想解放大潮的洗礼后,始终没有停下他们前进的步伐,没有给封建旧文学东山再起的机会。新文学作家在创造出新文学百花齐放的

繁荣局面的同时,也在酝酿着一个新的革命的高潮。在新文学发展的过程中,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中国的深入和扩大,特别是中国革命斗争的日益激烈,新文化队伍内部也不断分化,新文学在不断的斗争中开始沿着一条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轨迹向前发展。其中,有两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和发展倾向,即,不断深化的艺术探索和不断高涨的革命追求。

这一时期又称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

2. 左翼时期(1928—1937)

1927年4月12日,发生在上海的反革命政变,断送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极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坛的面貌。以前繁荣而自由的文坛凋零了,无产阶级文学却获得了崭露头角和发展壮大的机会。

1928年1月,在世界性的左翼思潮影响下,由蒋光慈等中共作家成立的太阳社和由冯乃超等从日本新近归国的激进作家组成的后期创造社,共同发起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运动”。他们与鲁迅、茅盾等“五四”时期的元老作家,围绕着“革命与文学”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即著名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这场论争,一方面加剧了新文学内部的分化,另一方面也促成了革命文学的传播和左翼作家的联合,是新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发展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

1930年3月,新组成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立即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左翼文艺运动”,并成为20世纪30年代文坛的主流。左翼文艺运动对于新文学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而这一运动所取得的卓著成就,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慌。为了与左翼文艺运动相抗衡,国民党政府发起了一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凭借政府的力量在全国各地创办了十多个带有明显官方色彩和政治倾向性的刊物,但始终没有形成具有体系的理论,也没有产生具有艺术性的作品。因此,掌握着政权的国民党政府虽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决定这个时期文学基本面貌的仍然是“左联”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以及受“左联”影响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

这一时期又称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或“30年代”。

3. 战争时期(1937—1949)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作家们因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而受到长期压抑的激情终于得以爆发。仅仅一个月后,由夏衍等16位剧作家集体创作的三幕剧《保卫卢沟桥》就在上海公演,这是抗战爆发后出现的第一部抗战题材的剧作。从此,抗战文学的号角响彻整个文坛。

抗战爆发对中国文学的直接影响,还表现为因政治格局的对立而形成的文化

格局的分割。自抗战以后,中国文坛就出现了因政治原因而分割成几个地区性文学的特殊现象: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学,称为解放区文学;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的文学,称为国统区文学;日本侵略军占领地区的文学,称为沦陷区文学;此外,被日军包围的上海租界内的文学,则称为孤岛文学。

1938年5月,武汉失守前后,文艺运动的中心转移到战时的“陪都”重庆,西南边陲重镇昆明因为东南沿海众多高校的纷纷内迁,出现了文化上的空前繁荣。随着战事的恶化,抗战初期高涨的热情随之冷落,文学创作也更多地出现了愤怒情绪、苦难意识和暴露倾向。孤岛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却因政治气候的不同,表现出与国统区文学不同的特点。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期间,一部分留守上海的作家在如同“孤岛”般的租界里,仍然坚持文学创作,在杂文和历史剧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抗日民主根据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和著名作家,延安成为大家心中的“圣地”。解放区文学的勃兴,为后来的新中国文学奠定了基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后,抗战进入了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相持阶段,国民党趁机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从抗战开始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实际上已经破裂,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内战”已经开始。同时,“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等地区性的文学,都在这一年前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文学的地区性特点越发鲜明。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入英法等国租界,一度十分活跃的“孤岛”也变为了沦陷区,滚滚硝烟中只剩下了市民文学和汉奸文学,很难再听到抗战的声音。

在国统区,1942年9月,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在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办的《文化先锋》创刊号上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否定了从写实主义到印象主义的所有文艺流派,国民党政府在文化上公开采取法西斯主义政策。由此,国统区完全进入了文化专制主义的黑暗时期。

在解放区,1942年5月,在延安进行的全党整风运动中,召开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艺座谈会。会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两次讲话,后结集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成为解放区文学,特别是后来新中国文学的纲领性文献。这次整风运动,也被人们看作继五四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有的文学史家也据此将1917年、1942年和1978年看作新文学发展历史分期的依据。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以文学革命为发端的新文学真正开始进入农村,“五四”新文学的成果也真正普及到农民群众之中;新文学作家自觉或不自

觉地从“启蒙者”变成了“被教育”的对象,启蒙文学传统也真正地让位于战争文化传统。

1945年抗战胜利后,沦陷区文学没有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实现了解放区文学和国统区文学的“会师”,但是,这种因政治因素而形成的分割格局,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根本改变,只是解放区文学扩展到了整个大陆,国统区文学缩小到了台湾群岛,而香港及澳门的文学则仍然具有孤岛文学的性质。这一时期又称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或“40年代”。

二、从“启蒙文学”到“文学启蒙”

纵观中国文学从“现代”到“当代”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个近百年的文学发展过程,是一个文学不断介入社会生活并反映社会变革的过程,因此,它不断受到政治的干扰,文学与政治几乎始终处于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文学的功利性也时强时弱地伴随始终。同时,我们还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个百年的文学发展过程,也是一个文学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一个不断地进行自我创新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简单地描绘为从“启蒙文学”到“文学启蒙”的过程。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产物,也是中国社会变革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20世纪初,文学是革命家手中最为有力也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武器,而革命则是文学家心中最为迫切也最为崇高的目标和理想。在当时,“启蒙文学”与“文学启蒙”两股文学思潮是同时存在的,并以“启蒙文学”为核心形成了“‘五四’新文学传统”。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爆发,一切文学都打上了战时的烙印,启蒙的主题逐渐让位于救亡的主题,救亡文学成为时代的主流,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战争文化传统”。

“五四”时期的启蒙主题并非从“五四”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同样,抗战时期的救亡主题也不是从抗战时期才开始的。实际上,救亡的主题一直伴随着自新文学诞生以来的中国文学,只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而日益凸显,到1936年开始出现“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时,实际上已经达到了高潮,战争的爆发只是将救亡的主题推上了时代的主流位置。在这一时期,曾在20世纪30年代叱咤风云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1936年10月宣告自动解散,取而代之的是1938年3月于汉口成立的另一个规模更大的作家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一个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开始了。这场长达八年的民族战争,虽然未能结束中国的灾难和战乱,却第一次结束了中国屡战屡败、挨打受辱的历史。战争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极大地改变了文学家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心理,他们主动承担起救亡的重任,各流派的作家和各文体的作品都打上了战时的烙印,“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始终关注的包括“个性解放”和“社会革命”在内的“启蒙”主题,都自觉地让位于民族解放的救亡主题。

自抗战以后,在启蒙主题上形成的“‘五四’新文学传统”和在救亡主题上形成的“战争文化传统”,一直影响着20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学。“‘五四’新文学传统”虽然随着战争的爆发而让位于战争文化传统,但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消失;战争文化传统虽然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成为文坛的主角,却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从文学史的发展角度看,两个传统虽然有着血缘上的内在联系,但是,“战争文化传统”毕竟不是“‘五四’新文学传统”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战争外力作用的产物。因此,这两种传统虽然有时也以相互补充和融合的方式出现,但是更多的时候则表现为彼此的冲突和抵触。

由于新中国文学实际上是解放区文学的继续和发展,而解放区文学则是战争的直接产物,因此,从1937年抗战爆发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战争文化传统”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颠沛流离和战火洗礼,由文学革命开创的新文学,终于带着一路风尘随中国社会一起进入到了一个安定和平的新时期,人们一直无暇顾及的文学自身的建设,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文学启蒙”开始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注意,“‘五四’新文学传统”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文学启蒙”逐渐取代了“启蒙文学”的核心地位而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

如果我们选择一个词来概括和总结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那么,既可以选择“现代”,也可以选择“创新”,但我更倾向于选择“启蒙”。实际上,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许多文学史家们就热衷于用“启蒙”一词来描述这一百年来的文学,不但习惯于将“启蒙”与文学、文化、主义、思想、思潮、运动等诸多概念联系在一起,而且更愿意从“启蒙文学”与“文学启蒙”或者是“启蒙”与“救亡”等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补充的视角,来分析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甚至把中国文学的这个世纪直接称为“启蒙的世纪”。

所谓“启蒙文学”,就是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文学直接承担起批判国民性、唤醒愚昧的民众、宣传先进的科学民主思想等社会的和政治的作用,在强调文学的艺

术性的同时,更加强调文学的思想性,要求文学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保持同步性甚至超前性。梁启超可以看作其先驱,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作家可以看作其主要代表,而稍后的老舍、巴金、曹禺、胡风、艾青、赵树理,以及后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则可以视为其继承者。

所谓“文学启蒙”,就是文学对自身进行审美意义上的建设:反对将文学看作社会革命的“工具”,而强调以文学自身如何现代化、如何建立起现代汉语的审美标准为目标,实现文学的理想境界,虽然也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努力推动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但并不要求文学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同步。王国维可以看作其先驱,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等作家可以看作其主要代表,而稍后的卞之琳、萧红、穆旦可以视为以上作家的继承者,再后来的汪曾祺和“文化寻根”、先锋小说等则可以看作其真正的建立者。

当然,“启蒙文学”与“文学启蒙”并不是两个截然对立的文学潮流,它们两者间始终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必然关系,始终是一个互为依存的整体。“启蒙文学”在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的同时,也追求着自己的审美理想;而“文学启蒙”在建设自己的审美标准时,也渴望能对民众的心智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用从“启蒙文学”到“文学启蒙”来概括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并不是说中国文学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直线发展的,而是说从 20 世纪初开始,由于国家和民族的内忧外患,由于政府和民众的愚昧无知,“启蒙文学”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五四’时期”也可以称为“启蒙时期”。但是,从这时期开始,“文学启蒙”就一直是一股细小而又十分顽强的潜流。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作家个性得以自由舒展,文学的审美精神得以全面复苏,“五四”以来被长期遮蔽的审美传统也重新发扬光大。

目 录

绪论 现代文学概述	1
第一章 “五四”时期的文学(1917—1927)	7
第一节 古代文学的终结与现代文学的诞生	7
第二节 周氏兄弟与“五四”散文的繁荣	14
第三节 郭沫若与白话诗的崛起	28
第四节 鲁迅与现代小说的开端	39
第五节 现代话剧的引进与模仿	51
第二章 左翼时期的文学(1928—1937)	58
第一节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58
第二节 新诗的艺术化与革命化	61
第三节 小说的三足鼎立与四分天下	71
第四节 曹禺与话剧的中国化	100
第五节 散文的战斗性与多样化	108
第三章 战争时期的文学(1937—1949)	118
第一节 三个地区文学的不同发展	118
第二节 小说的成熟与收获	121
第三节 诗歌的愤怒与智慧	135
第四节 戏剧的拟古与写实	144
第五节 报告文学的崛起与杂文的“鲁迅风”	149
参考文献	152

绪论 现代文学概述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人们习惯于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特征,将其分割为两个时期:1917年1月“文学革命”开始后至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前的文学,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现在也有人称为“民国文学”;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以后的文学,称为“中国当代文学”。这两个阶段的文学,如果连在一起讲,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

1. “五四”时期(1917—1927)

1917年1月和2月,《新青年》分别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标志着“文学革命”正式开始。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宣告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终结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

文学革命,同这时期所有的革命运动一样,也是以政治革命为目标的,同时,也是受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产生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封建思想,而长期以来,封建文学已经成为封建思想的重要载体,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要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就必须废除它的载体。而要彻底废除封建文学,就必须进行文学革命。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必然导致一场文学革命的产生。文学革命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

到1921年,酝酿多年的文学革命只经过了短短四年“火山式的爆发”,就迅速地进入了成熟和收获的季节。新文学运动逐渐趋于高潮,传统旧文学几乎完全崩溃。在这一年里,随着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许多重要文学社团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以文学革命为起点的新文学出现了一个流派蜂起、异彩纷呈的繁荣局面。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沉沦》,特别是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的先后面世,标志着新文学完全战胜了旧文学,确立了新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主流地位。

1923年以后,虽然狂飙突进式的革命风暴逐渐跌入了低潮,但是,被文学革命唤醒的新文学作家,在经过思想解放大潮的洗礼后,始终没有停下他们前进的步伐,没有给封建旧文学东山再起的机会。新文学作家在创造出新文学百花齐放的

繁荣局面的同时,也在酝酿着一个新的革命的高潮。在新文学发展的过程中,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中国的深入和扩大,特别是中国革命斗争的日益激烈,新文化队伍内部也不断分化,新文学在不断的斗争中开始沿着一条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轨迹向前发展。其中,有两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和发展倾向,即,不断深化的艺术探索和不断高涨的革命追求。

这一时期又称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

2. 左翼时期(1928—1937)

1927年4月12日,发生在上海的反革命政变,断送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极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坛的面貌。以前繁荣而自由的文坛凋零了,无产阶级文学却获得了崭露头角和发展壮大的机会。

1928年1月,在世界性的左翼思潮影响下,由蒋光慈等中共作家成立的太阳社和由冯乃超等从日本新近归国的激进作家组成的后期创造社,共同发起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运动”。他们与鲁迅、茅盾等“五四”时期的元老作家,围绕着“革命与文学”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即著名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这场论争,一方面加剧了新文学内部的分化,另一方面也促成了革命文学的传播和左翼作家的联合,是新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发展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

1930年3月,新组成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立即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左翼文艺运动”,并成为20世纪30年代文坛的主流。左翼文艺运动对于新文学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而这一运动所取得的卓著成就,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慌。为了与左翼文艺运动相抗衡,国民党政府发起了一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凭借政府的力量在全国各地创办了十多个带有明显官方色彩和政治倾向性的刊物,但始终没有形成具有体系的理论,也没有产生具有艺术性的作品。因此,掌握着政权的国民党政府虽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决定这个时期文学基本面貌的仍然是“左联”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以及受“左联”影响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

这一时期又称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或“30年代”。

3. 战争时期(1937—1949)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作家们因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而受到长期压抑的激情终于得以爆发。仅仅一个月后,由夏衍等16位剧作家集体创作的三幕剧《保卫卢沟桥》就在上海公演,这是抗战爆发后出现的第一部抗战题材的剧作。从此,抗战文学的号角响彻整个文坛。

抗战爆发对中国文学的直接影响,还表现为因政治格局的对立而形成的文化

格局的分割。自抗战以后,中国文坛就出现了因政治原因而分割成几个地区性文学的特殊现象: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学,称为解放区文学;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的文学,称为国统区文学;日本侵略军占领地区的文学,称为沦陷区文学;此外,被日军包围的上海租界内的文学,则称为孤岛文学。

1938年5月,武汉失守前后,文艺运动的中心转移到战时的“陪都”重庆,西南边陲重镇昆明因为东南沿海众多高校的纷纷内迁,出现了文化上的空前繁荣。随着战事的恶化,抗战初期高涨的热情随之冷落,文学创作也更多地出现了愤怒情绪、苦难意识和暴露倾向。孤岛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却因政治气候的不同,表现出与国统区文学不同的特点。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期间,一部分留守上海的作家在如同“孤岛”般的租界里,仍然坚持文学创作,在杂文和历史剧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抗日民主根据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和著名作家,延安成为大家心中的“圣地”。解放区文学的勃兴,为后来的新中国文学奠定了基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后,抗战进入了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相持阶段,国民党趁机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从抗战开始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实际上已经破裂,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内战”已经开始。同时,“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等地区性的文学,都在这一年前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文学的地区性特点越发鲜明。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入英法等国租界,一度十分活跃的“孤岛”也变为了沦陷区,滚滚硝烟中只剩下了市民文学和汉奸文学,很难再听到抗战的声音。

在国统区,1942年9月,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在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办的《文化先锋》创刊号上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否定了从写实主义到印象主义的所有文艺流派,国民党政府在文化上公开采取法西斯主义政策。由此,国统区完全进入了文化专制主义的黑暗时期。

在解放区,1942年5月,在延安进行的全党整风运动中,召开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艺座谈会。会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两次讲话,后结集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成为解放区文学,特别是后来新中国文学的纲领性文献。这次整风运动,也被人们看作继五四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有的文学史家也据此将1917年、1942年和1978年看作新文学发展历史分期的依据。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以文学革命为发端的新文学真正开始进入农村,“五四”新文学的成果也真正普及到农民群众之中;新文学作家自觉或不自

觉地从“启蒙者”变成了“被教育”的对象,启蒙文学传统也真正地让位于战争文化传统。

1945年抗战胜利后,沦陷区文学没有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实现了解放区文学和国统区文学的“会师”,但是,这种因政治因素而形成的分割格局,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根本改变,只是解放区文学扩展到了整个大陆,国统区文学缩小到了台湾群岛,而香港及澳门的文学则仍然具有孤岛文学的性质。这一时期又称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或“40年代”。

二、从“启蒙文学”到“文学启蒙”

纵观中国文学从“现代”到“当代”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个近百年的文学发展过程,是一个文学不断介入社会生活并反映社会变革的过程,因此,它不断受到政治的干扰,文学与政治几乎始终处于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文学的功利性也时强时弱地伴随始终。同时,我们还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个百年的文学发展过程,也是一个文学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一个不断地进行自我创新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简单地描绘为从“启蒙文学”到“文学启蒙”的过程。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产物,也是中国社会变革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20世纪初,文学是革命家手中最为有力也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武器,而革命则是文学家心中最为迫切也最为崇高的目标和理想。在当时,“启蒙文学”与“文学启蒙”两股文学思潮是同时存在的,并以“启蒙文学”为核心形成了“‘五四’新文学传统”。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爆发,一切文学都打上了战时的烙印,启蒙的主题逐渐让位于救亡的主题,救亡文学成为时代的主流,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战争文化传统”。

“五四”时期的启蒙主题并非从“五四”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同样,抗战时期的救亡主题也不是从抗战时期才开始的。实际上,救亡的主题一直伴随着自新文学诞生以来的中国文学,只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而日益凸显,到1936年开始出现“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时,实际上已经达到了高潮,战争的爆发只是将救亡的主题推上了时代的主流位置。在这一时期,曾在20世纪30年代叱咤风云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1936年10月宣告自动解散,取而代之的是1938年3月于汉口成立的另一个规模更大的作家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一个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开始了。这场长达八年的民族战争,虽然未能结束中国的灾难和战乱,却第一次结束了中国屡战屡败、挨打受辱的历史。战争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极大地改变了文学家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心理,他们主动承担起救亡的重任,各流派的作家和各文体的作品都打上了战时的烙印,“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始终关注的包括“个性解放”和“社会革命”在内的“启蒙”主题,都自觉地让位于民族解放的救亡主题。

自抗战以后,在启蒙主题上形成的“‘五四’新文学传统”和在救亡主题上形成的“战争文化传统”,一直影响着20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学。“‘五四’新文学传统”虽然随着战争的爆发而让位于战争文化传统,但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消失;战争文化传统虽然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成为文坛的主角,却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从文学史的发展角度看,两个传统虽然有着血缘上的内在联系,但是,“战争文化传统”毕竟不是“‘五四’新文学传统”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战争外力作用的产物。因此,这两种传统虽然有时也以相互补充和融合的方式出现,但是更多的时候则表现为彼此的冲突和抵触。

由于新中国文学实际上是解放区文学的继续和发展,而解放区文学则是战争的直接产物,因此,从1937年抗战爆发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战争文化传统”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颠沛流离和战火洗礼,由文学革命开创的新文学,终于带着一路风尘随中国社会一起进入到了一个安定和平的新时期,人们一直无暇顾及的文学自身的建设,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文学启蒙”开始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注意,“‘五四’新文学传统”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文学启蒙”逐渐取代了“启蒙文学”的核心地位而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

如果我们选择一个词来概括和总结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那么,既可以选择“现代”,也可以选择“创新”,但我更倾向于选择“启蒙”。实际上,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许多文学史家们就热衷于用“启蒙”一词来描述这一百年来的文学,不但习惯于将“启蒙”与文学、文化、主义、思想、思潮、运动等诸多概念联系在一起,而且更愿意从“启蒙文学”与“文学启蒙”或者是“启蒙”与“救亡”等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补充的视角,来分析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甚至把中国文学的这个世纪直接称为“启蒙的世纪”。

所谓“启蒙文学”,就是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文学直接承担起批判国民性、唤醒愚昧的民众、宣传先进的科学民主思想等社会的和政治的作用,在强调文学的艺

术性的同时,更加强调文学的思想性,要求文学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保持同步性甚至超前性。梁启超可以看作其先驱,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作家可以看作其主要代表,而稍后的老舍、巴金、曹禺、胡风、艾青、赵树理,以及后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则可以视为其继承者。

所谓“文学启蒙”,就是文学对自身进行审美意义上的建设:反对将文学看作社会革命的“工具”,而强调以文学自身如何现代化、如何建立起现代汉语的审美标准为目标,实现文学的理想境界,虽然也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努力推动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但并不要求文学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同步。王国维可以看作其先驱,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等作家可以看作其主要代表,而稍后的卞之琳、萧红、穆旦可以视为以上作家的继承者,再后来的汪曾祺和“文化寻根”、先锋小说等则可以看作其真正的建立者。

当然,“启蒙文学”与“文学启蒙”并不是两个截然对立的文学潮流,它们两者间始终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必然关系,始终是一个互为依存的整体。“启蒙文学”在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的同时,也追求着自己的审美理想;而“文学启蒙”在建设自己的审美标准时,也渴望能对民众的心智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用从“启蒙文学”到“文学启蒙”来概括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并不是说中国文学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直线发展的,而是说从 20 世纪初开始,由于国家和民族的内忧外患,由于政府和民众的愚昧无知,“启蒙文学”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五四’时期”也可以称为“启蒙时期”。但是,从这时期开始,“文学启蒙”就一直是一股细小而又十分顽强的潜流。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作家个性得以自由舒展,文学的审美精神得以全面复苏,“五四”以来被长期遮蔽的审美传统也重新发扬光大。

第一章 “五四”时期的文学(1917—1927)

第一节 古代文学的终结与现代文学的诞生

一、前“五四”文学

所谓“前‘五四’文学”，是指自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维新派从政治改良转向文学改良，到1917年文学革命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拉开大幕，这一新旧文学交替期间的文学。

在1898年以前的19世纪末，传统旧文学虽已呈现出明显的衰退趋势，但其霸主地位尚未受到真正威胁。1868年黄遵宪在《杂感》一诗中提出了“我手写我口”的主张，但当时响应者寥寥，谭嗣同、夏曾佑创作的新派诗也处于孤掌难鸣的尴尬境地，而王韬等人倡导的新文体更是无声无息，这些新主张都处于无人喝彩的状态。而军政大臣曾国藩支持的桐城中兴运动、宋诗运动、汉魏六朝诗派和晚唐诗派等复古运动，则以力挽狂澜之势，纷纷崛起，声势浩大，“在当时的实际影响要比新诗派诗人大得多”。

当时在上海通过主办《时务报》宣传变法维新的梁启超，已经开始意识到《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传统小说要比“六经”拥有更多的读者，发现小说可以在民众教育和社会改革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严复、夏曾佑也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提出，应该利用小说来启发国民的觉悟。从这以后，洋务运动时期形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才开始从实务转向思想，曾经如日中天的维新派才开始在“科学救国”的追求之外顾及文化，文学也开始成为新民强国、政治启蒙的工具而受到已经觉醒的仁人志士们的青睐。然而，情况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情况出现了转机。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后，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文化宣传之中，竭力推进文学改良，发动了一场以文学为工具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一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创刊号上发表的康有为的《译印政治小说序》，提出了“政治小说”的概念，把文学的翻译看作政治启蒙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始了“小说界革命”的前奏；同时，他还在《清议报》上附设“诗界潮音集”，着手“诗界革命”的试验，使晚清悄无声息的“诗界革命”死灰复燃。“小说界